

WEHR MAC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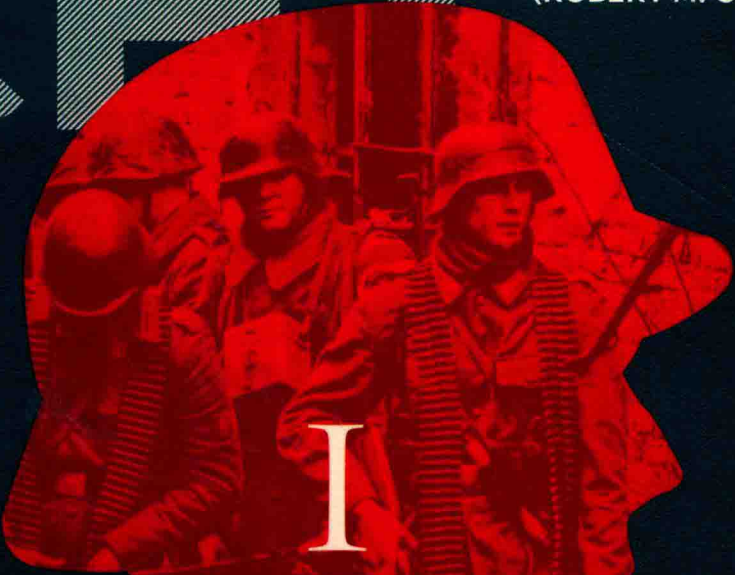
第一部

国防军

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

[美] 罗伯特·M. 奇蒂诺
(ROBERT M. CITINO) 著

胡毅秉 译



I
DEATH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台海出版社

第一部

国防军

折戟沉沙，1942年德军历次战役

[美] 罗伯特·M. 奇蒂诺 (ROBERT M. CITINO) 著

胡毅秉 译



台海出版社

DEATH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By ROBERT M. CITINO
Copyright: © 2007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ChongQing Vertic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9）第 06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防军：第一部．折戟沉沙，1942 年德军历次战役．／
（美）罗伯特·M. 奇蒂诺著；胡毅秉译．—北京：台海
出版社，2019.5

书名原文：Death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ISBN 978-7-5168-2324-8

I. ①国… II. ①罗… ②胡…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争史－史料－德国 IV. ①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5661 号

国防军：第一部．折戟沉沙，1942 年德军历次战役

著 者：[美] 罗伯特·M. 奇蒂诺

译 者：胡毅秉

责任编辑：俞滢荣
视觉设计：王 涛

策划制作：指文文化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 - 64041652（发行，邮购）

传 真：010 - 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412 千

印 张：24

版 次：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2324-8

定 价：1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让我们先想象一下德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时间是 1942 年，对德国军队来说这是宿命的一年：

“不可思议，”费多尔·冯·鲍克元帅（Marshal Fedor von Bock）喃喃自语，“真是绝了。”他站在洛佐瓦（Lozovaia）城东南郊外一个小山丘上的观察所里，看着眼前的景象不住地摇头。历史上有幸目睹他脚下这种壮观场面的将领可谓是凤毛麟角：敌人的整整一支大军被包围在区区几千平方米的狭小包围圈中。鲍克不断调整着双筒望远镜的视野，来回扫视这个包围圈。整片区域东西宽不过 3.2 千米，南北长大概 16.1 千米左右，其中的每一寸土地都在沸腾。被尘土染成棕色的步兵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坦克纵队或许能让人脚不沾地在车辆之间转移，各种大小和型号的火炮令人目不暇接——这一切都在漫无目的地乱跑，虽然在不断移动，却没有明显的计划或目标。在这些步兵、坦克和车辆的头上，有成百上千架德国空军的对地攻击机发出轰鸣，这些是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的小伙子们：“斯图卡”、Bf-109、Ju-88 正在轰炸、扫射和驱赶着敌人。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员、坦克、火炮和骡马挤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飞行员们根本不可能错失目标。鲍克心想，他们或许正在幸灾乐祸地大笑，而他的炮兵们可能也是一样——在观察战场时，他能看到四面八方都有炮火射向他脚下这些正在无助地挣扎的人们。到处都在爆炸，包围圈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翻腾着火焰和烟雾。

鲍克想起了许多年前自己作为学员在军校里学到的一个术语：Kesselschlacht（包围战），字面意思是“大锅战”。用这个字眼来描述脚下发生的事情真是再合适不过：敌人的整整一支大军正在大锅里被生煎活煮。他记得自己曾学习过大选帝侯（Great Elector）、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布吕歇尔（Blücher）和毛奇（Moltke）等人的战例——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年代都堪称赌徒：擅长大胆机动，从侧翼和后方发动勇猛攻击，打出一场场包围战。由此他又想起了另一个

术语：Vernichtungsschlacht，意思是“歼灭战”。

这时，下面的修罗场中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鲍克并不知道原因其实是一架“斯图卡”投下的一枚 500 磅（约合 226.8 千克）炸弹刚好命中了苏军的一支弹药车队。炸弹的爆炸和随之而来的殉爆造成了 300 多人死伤。自己听到的惨叫声是怎么回事？是人？是马？或许都无关紧要了。鲍克又回到了沉思中。他又想起了多年前的课程，还有那些红色封面的精装教材——它们的名字是 Der Schlachterfolg，意思是“胜利之战”——它们介绍了历代伟大德国统帅的征战，是第一学年的必读教材。伟大的骑兵指挥官塞德利茨（Seydlitz）在罗斯巴赫（Rossbach）截断倒霉的法军的行军路线，并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将其歼灭。约克（Yorck）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过易北河（Elbe River）机动到了拿破仑大军的后方，使这位法国皇帝陷入了困境，并直接导致他在莱比锡（Leipzig）的败北。这一战之后普鲁士国王有没有赐给约克一个新的头衔？有，鲍克想道，叫“约克·冯·瓦滕堡”。最精彩的是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的那次机动，他冒着一路军队被歼灭的风险，沉着地等待另一路大军痛击奥地利军队的侧翼。鲍克很早就记住了所有这些战役的细节，不仅能够背诵每一战中的双方序列，还能凭记忆在黑板上画出每一战的示意图。

虽然鲍克已经 61 岁了，但此时他感觉自己又恢复了青春。他忽然意识到，这些永垂青史的战役没有一场能和此时在他脚下发生的这一场战役相比。以顺利程度、速度和决定性意义来衡量，这可能是德国军队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他们会在那份名单上再添一个名字。”他咯咯轻笑。也许他甚至能得到一个头衔，就像老约克一样，鲍克窃笑着将它从舌尖吐出：“费多尔·冯·鲍克·翁德·哈尔科夫（Fedor von Bock und Kharkov）。”

在鲍克元帅脚下，一支敌人的大军正在死去。

上述场景可能显得有些奇怪。对精通二战历史的研究者而言，1942 年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¹，这一年发生了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太平洋上还发生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历史潮流从此逆转——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措辞来说，就是“命运之枢机”。²这是德国国防军（Wehrmacht）折戟沉沙的一年，也是德国人的征服梦想破灭的一年。但同样是在这一年，德军一开始却取得了至少五场在其悠久的军事史中可以名列前茅的大胜：在苏联的刻赤（Kerch）、哈尔科夫（Kharkov）

和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 以及北非的贾扎拉 (Gazala) 和托布鲁克 (Tobruk)。国防军在其本就辉煌的胜利纪录中写下了新的篇章。

在战略层面上, 1941 年 12 月的局势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德国早就已经和英国处于交战状态, 德国在 1940 年夏秋两季尝试以敷衍的态度结束战争未果后, 非但无所作为, 反而又给自己增添了新的敌人。1941 年 6 月, 在仍未征服英国的情况下, 德国又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 全面入侵苏联。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斗中, 国防军将苏联军队一支接一支地碾成齑粉: 在比亚韦斯托克 (Bialystok), 在明斯克 (Minsk), 在斯摩棱斯克 (Smolensk), 特别是在基辅 (Kiev), 概不例外。只是, 随着夏去秋来, “巴巴罗萨行动” 也被进军莫斯科的“台风行动” 取代。到了同年 12 月, 虽然苏联的首都已经在望, 但是苏联红军发动的大规模反攻, 导致德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不得不仓皇后撤。接下来, 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Pearl Harbor), 德国元首希特勒决定与他们一起对美国开战。在 1941 年的上半年, 德国的敌人只有英国一家。而此时, 仅仅过了六个月, 德国就要面对一个庞大而富有的敌国联盟。丘吉尔为了向他伟大的先祖马尔伯勒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致敬, 特地给这个联盟冠以“大同盟” (Grand Alliance) 之名。³

大同盟控制着全世界的大半资源, 囊括了首屈一指的海军和殖民强国 (英国)、最大的陆军强国 (苏联) 和睥睨全球的金融和工业巨人 (美国) ——这样的战争潜力碾压德国是绰绰有余的。好在事实证明, 驾驭这股强横的力量并非易事。尤其是美国, 它在加入这场战争时对于要如何作战只有极为模糊的认识。相关各方都将会明白, 有潜力击败德国与在战场上真正击败德国军队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问题: 德式兵法

事实将会证明, 实现击败德国军队这一目标的难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支军队长期习惯于在劣势物质条件下作战, 那么它一定就是德国军队。早在德意志国家的初创时代, 就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军事文化, 即德式兵法。从 17 世纪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 (Frederick William) 开始, 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 他们统治的这个小小国地处欧洲边缘, 比较贫困, 必须“短促而活跃” (kurtz und vives) 地作战。⁴ 这个国家身处中欧的四战之地, 被人力物力远超自己的国家所环绕, 不可能打赢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从一开始, 普鲁士面临的军事问题就是找到一种方法来进行短暂而激烈的战争, 并以决定性的战场胜

利而告结束。也就是说，必须在冲突中以狂飙突进之势攻击敌人，施以快速而沉重的打击。

普鲁士的战略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德国人所谓的“Bewegungskrieg”，意即“运动战”。这种战争方式强调战役层面的机动，它并非仅仅着眼于战术机动性或更快的行军速度，更是着眼于师、军和集团军等大部队的运动。普鲁士的指挥官，以及后来他们的德国继承者，都追求通过巧妙的机动使这些部队尽可能迅速地对敌军重兵集团实施猛烈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这可能涉及对敌军的一个或两个缺乏保护的侧翼发动突袭。在多个著名的战例中，这种做法甚至使普鲁士或德国的整支大军进至敌军的后方，达成了任何钻研过战争艺术的将领都梦寐以求的态势。德国人的目标就是“Kesselschlacht”——其字面意思是“大锅战”，但更准确的含义是包围战，即从四面八方合围敌军，然后通过一系列向心攻击歼灭之。

这种积极进取的作战方式对德国军队提出了若干要求，这里仅举两例：水平极高的战场攻击能力，以及无论机会大小都倾向于发起进攻的军官团。经过多年实践后德国人还发现，实施战役级别的运动战需要一套给下级指挥官提供大量主动权的灵活指挥体系。今天人们习惯将这套指挥体系称为“任务式策略”（Auftragstaktik）：上级指挥官拟定一个大致的任务（Auftrag），然后让身处一线的军官决定完成任务的方法。但是用德国人自己的说法来描述其实更为准确，那就是“下级军官的独立性”（Selbständigkeit der Unterführer）。⁵ 指挥官评估局势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可以帮助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军队弥补一定实力差距，并使这支军队不会因为等待报告和命令在指挥链中上行下达而错失战机。

这种指挥体系不见得就是精妙非凡的。在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史上，充斥着下级指挥官犯错的例子：他们会不合时宜地推进，在极为不利，甚至匪夷所思的条件下发起进攻，而且通常喜欢自找麻烦——至少在上级指挥机关看来是如此。例如，爱德华·冯·弗利斯将军（General Eduard von Flies）在1866年的朗根萨尔察之战中对有工事依托、人数几乎两倍于他的汉诺威军队发起了军事史上最愚蠢的正面突击之一⁶；卡尔·冯·施泰因梅茨将军（General Karl von Steinmetz）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对第1集团军的鲁莽指挥几乎打乱了整个作战计划⁷；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将军（General Hermann von François）在1914年的抗命不从，几乎使东普鲁士会战毁于一旦。⁸ 虽然这些事件如今几乎已被遗忘，但它们代表了德国军事传统中积极与好斗的一面，和卡尔·马里亚·冯·克劳塞维

茨（Karl Maria von Clausewitz）、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或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所代表的较为缜密与理智的思路截然相反。换言之，这些战场上的猛将倾向于将指挥官的精神力量置于对目的和手段的理性思考之上。

虽然“运动战”（Bewegungskrieg）也许是普鲁士的战略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但它确实不是什么万灵药——它的优点和缺点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腓特烈大帝以一场经典的先发制人式战役开始了这场战争，他集结起一支大军入侵奥地利的波希米亚（Bohemia）行省，在布拉格城下以一系列极为大胆的攻击沉重打击了奥地利军队，从而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但不巧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腓特烈的军队也遭受了重创。当奥地利人派出一支军队为布拉格解围时，腓特烈又在科林（Kolin）攻击了他们。⁹可能是因为腓特烈自己犯的错，也可能是他手下某个野心过大的指挥官的错（一个碰巧叫冯·曼斯坦因的将军），总之腓特烈计划中对奥军右翼的攻击变成了对准备充分的敌军的正面突击，而且他与敌军的兵力对比是35000对50000。结果自然是普军遭受重创，仓皇败退。

此时腓特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奥军恢复了元气，俄军正从东方推进（虽然步伐缓慢），法军也从西方朝他进逼。好在腓特烈通过几场在那个年代最具决定性的胜利挽回了局势。首先，他在罗斯巴赫击溃了法军（1757年11月），此战中他手下另一个雄心勃勃的将领——骑兵指挥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塞德利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Seydlitz）（和曼斯坦因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将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将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自己的整支骑兵部队机动到了法军的行军路线上。¹⁰随后，在12月的洛伊滕（Leuthen），腓特烈凭借自己在战术机动方面的敏锐天赋，使整支普鲁士军队戏剧性地出现在了奥军防守薄弱的左翼侧面，令奥军指挥官方寸大乱。最后，在1758年8月，腓特烈在曹恩道夫（Zorndorf）使整支军队绕过俄军侧翼从后方发起进攻，并在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惨烈战斗后击退了对手。

通过几次经典的、短促而活跃的战役，腓特烈暂时挽救了自己。但是因为他的敌人拒绝与他讲和，整体局势依然严峻。腓特烈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同盟，拥有比他多了数倍的兵员、火炮和马匹。此时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立足于中心位置战斗¹¹，用小部队（往往由他的弟弟亨利亲王指挥¹²）控制次要地段，将主力快速机动到任何看起来受威胁最大的地段，在那里迫使敌人接受战斗并将其击溃。但

是，尽管普鲁士整体上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其军队的任务依然是充当一种精锐的攻击力量，必须随时准备急行军，发起凌厉的突击，然后又要再度急行军。普鲁士的军队无法消灭腓特烈的对手，无论是个别消灭还是全体歼灭都做不到，他们只能尽量对其中一个对手施以沉重打击，使得——姑且以法国为例——路易十五感到继续耗费金钱、时间或精力与腓特烈为敌得不偿失，从而退出战争。对普鲁士军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更何况战争头两年持续不断的进攻战已经使他们“刀锋变钝”，军官和精锐兵团的伤亡尤其严重。

此后普鲁士的所有战争都是以类似方式进行的，它总是在战争初期尝试通过运动战迅速取胜。不过，在一些战争中它败得特别惨，1806年10月对拿破仑的战事就是一例。此战中普鲁士军队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在西线和南线都是孤军深入。或许腓特烈大帝会认为这是发起进攻作战的理想态势，但遗憾的是，此时腓特烈早已作古，他手下的将领大多也到了耄耋之年，而普鲁士军队现在面对的是法兰西皇帝和他的大军团（这两者都处于各自的巅峰时期）。普鲁士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泰特（Auerstädt）的两场大战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这两场战役都可算得上是“运动战”（*Bewegungskrieg*），但可惜这些“运动战”（*Bewegungskrieg*）都是由法国人实施的。¹³

不过，普鲁士军队的另一些战役却成功地超出了其指挥官最狂野的想象。1866年，赫尔穆特·冯·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之战中大获全胜，在与奥地利的战争爆发仅八天后就奠定了胜局。¹⁴在1870年与法国的战争中，主要的战事也同样短暂。普军在8月4日越过法国边境，两个星期后就在圣普里瓦—格拉沃洛特（*St. Privat-Gravelotte*）打了一场大战。而随着整整一支法国大军与皇帝拿破仑三世一同在色当（*Sedan*）陷入重围，并在四面八方同时发起的进攻下烟消云散，这场战争的主要战事也告一段落，这可能是“*Kesselschlacht*”理念（即前文所述的“包围战”）有史以来最纯粹的体现。

在1914年，普鲁士军队（此时已经是德国军队）的战争学说经受了一次大规模检验。首战是动员和部署了不少于八个野战集团军的大规模战役，提出这一构想的人就是担任总参谋长至1906年的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和所有德国指挥官一样，他制定了一个大体的作战纲要（通常被错误地称作“施利芬计划”）¹⁵，他绝对没有拟定过任何具体或指令性的机动方案。按照德式兵法的惯例，那是由一线指挥官决定的。西线的首战仅以毫厘之差未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德

军粉碎了法国的五个野战集团军中的四个，并且差一点在那慕尔（Namur）包围了那最后的一个。他们距离赢得战争要比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的近得多，但最终还是在1914年9月的马恩河战役中功亏一篑。

马恩河的失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时刻。在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和前线指挥官看来，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七年战争的时代。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凑齐了，同样是被强大的敌国组成的联盟包围，军队的实力也同样不可能恢复到战争第一年秋天的大流血之前。新任司令官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General Erich von Falkenhayn）甚至对德皇威廉二世说，德国军队已经成为一台“运转失灵的机器”，无力赢得任何歼灭战的胜利。而最大的问题是，西线陷入了由战壕、铁丝网、机枪和支援火炮的拦阻网组成的僵局。再也没有机动灵活的运动战（Bewegungskrieg），只有与之截然相反的所谓 Stellungskrieg——即静态的阵地战。随着双方的军队都龟缩在战壕里互射炮弹，这场战争就成了标准的消耗战，而按照这种打法德国是绝对不可能赢的。

可即便在此时，德国人仍然认为，德国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迫使某个对手退出战争。虽然德国人确实成了防御战的专家，曾将协约国几乎从未间断的系列攻势一一化解，但他们自己也反复发动进攻，试图重开依旧被德国军官视作金科玉律的运动战。这些进攻战大多以俄军为目标，但在1916年和1918年，西线也曾有过超大规模的攻势——分别是凡尔登战役和1918年春所谓的“皇帝会战”（Kaiserschlacht）。此外，还有1916年针对罗马尼亚人和1917年在卡波雷托（Caporetto）针对意大利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以后德军的专业期刊《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对罗马尼亚会战（这是一个快速 Bewegungskrieg 的经典战例）的研究之多几乎不亚于它对规模远大于此的西线历次阵地战的研究。¹⁶ 四年漫长的堑壕战耗尽了德国军队的元气，并最终使他们屈服，却并未改变德国军官团对军事行动的看法。

读者此时应该已经明白，1914年之后国防军被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强敌包围的局面在德国军事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这场战争也有其独特之处，例如希特勒关于欧洲和世界帝国的宏大计划、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对种族灭绝的热忱，以及国防军自身在希特勒政权的罪行中的自愿参与。但是，从作战层面上讲，这场战争一如既往。国防军及其指挥机构和军官团所做的事也就是普鲁士军队在腓特烈大帝领导下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军队在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及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领导下所做的事。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德国国防军一直在千方百计对自己的某个敌人施以重击——希望这样的打击足以拆散敌国联盟,或者至少让同盟国认清为了胜利需要付出的代价。虽然这套战略确实失败了,但在战争的最后四年它确实给同盟国造成了一定损失,而且直到最后都足以让英、苏、美等国的指挥官们愁白头发。

虽然以破坏敌国联盟为目标而发动反复进攻的战略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和后世,始终没有人能对德国面临的战略难题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打赢战争的战略?在这场战争中显然不存在。对于和世界为敌的德国来说这就是最佳战略吗?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它是与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历史和传统一致的作战策略吗?或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本书

在1942年，国防军对“如果闪电战失败了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做了很有德国特色的回答：再发动一场闪电战。在1941年，通过一场闪电战击败苏联的尝试在莫斯科城下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冬天则成了德国军队历史上最难熬的时期之一。虽然最终德国军队挺了过来，但是却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超过100万人）和武器装备的损失，直到次年春天都没有恢复元气。尽管人力短缺、后勤补给匮乏，德国最高指挥机关——阿道夫·希特勒、陆海空三军的首脑和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General Franz Halder）却立即开始谋划在苏联发动新一轮攻势。他们选择了南方战线，并把目标定为高加索（Caucasus）的油田。如果能够攫取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德国就将获得大量石油资源，不仅几乎能把战争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还能使苏联的战时经济永久瘫痪。在进攻这一目标的途中，德国军队必须通过封锁或占领伏尔加河（Volga River）畔的城市——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来阻止苏联的援军到达该地区。在发动这个代号为“蓝色行动”（Operation Blue）的攻势之前，还必须实施某些预备性作战：例如肃清克里米亚（Crimea）的苏军，或是消除极不规整的战线上的若干突出部。¹⁷对一支好不容易熬过上一个冬天的军队来说，这是一次大动干戈。由于这些作战对国防军提出的要求实在太太，德军总司令部别无选择，只能依靠盟国和卫星国提供大量人力：包括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尤其是罗马尼亚人。

虽然这年春天国防军的主力将会在东线征战，但德国还有一支重兵已经在北非与英军接触。“西部沙漠”（因为位于“埃及以西”）对埃尔温·隆美尔将军（General Erwin Rommel）的非洲装甲集团军来说是一块很不寻常的战场。这个集团军本身也是一支联军：拥有两个德国装甲师（合编为非洲军）、德国第90轻装师（一支特别针对沙漠环境而装备和训练的摩托化部队），以及众多意大利师。意大利军队中包括少数摩托化部队（“公羊”装甲师就是一例），但大部分是靠两条腿机动的步兵。当5月来临时，隆美尔的军队面对的是规模大得多、装备也更好的英国

第8集团军，而且该部已经在深入贾扎拉以南沙漠中的坚固阵地布防。在沙漠战中有许多独特的作战问题，但也有一些不变的规律。一如在蓝色行动中国防军要出兵攻击远比自己庞大和富有的敌军，隆美尔在面对拥有数量优势和工事依托的敌军时，也做出了很有德国特色的选择：针对贾扎拉发起代号为“忒修斯行动”（Operation Theseus）的攻势，而这一仗将成为他军事生涯的顶峰。

我打算将本书作为我的上一本书《德式兵法：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的续作之一。《德式兵法：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论述了300年的军事历史，而本书将分析德国军队在大约七个月时间里的作战，始于蓝色行动和忒修斯行动发起，止于非洲装甲集团军在阿拉曼之战中覆灭和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本书将详细论述这决定性的几个月内德国军队在包括东线和北非战线的战场上的军事行动。首先，我们将概述1941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和苏联境内的战役，然后讲述东线重燃的战火，即德国人所谓的“第二次会战”的发起。¹⁸ 战斗首先在与其他地区近乎隔绝的克里米亚半岛打响，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General Erich von Manstein）将在那里书写他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又一新篇章。他将首先在具有很高机动性的刻赤战役中粉碎克里米亚东部的苏军，取得一场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奇迹般的大胜，然后对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发起一次虽然代价高昂但还是以胜利而告终的进攻。

然后我们将把视线转向北面。“弗里德里库斯行动”（Operation Fridericus）是蓝色行动开始前调整东方战线的预备性攻势之一。这一行动针对的是在德军控制的哈尔科夫和苏军控制的伊久姆（Izium）之间指向德军防线的一个尖锐突出部（即“伊久姆突出部”），但就在德军万事俱备、枕戈待旦之际却发生了异乎寻常的情况。苏联红军主动从伊久姆突出部向哈尔科夫发动了进攻。这是一支新式的苏军部队，其骨干力量是坦克和更多的坦克，与德军自1941年以来习惯对抗的大步兵集团大不相同。双方装甲部队的碰撞是截至此时规模最大的坦克战之一，而结果则是德国军队历史上最辉煌的歼灭战胜利之一。

刻赤和哈尔科夫的大胜仅仅过去几周，隆美尔就将在贾扎拉发动他自己的大规模攻势。他面临的局面似乎特别不适合进攻，人力水平、坦克与火炮的数量、防御工事的固有强度——所有这些关键要素都明确倾向于英军。但非洲装甲集团军也有一些优势：不仅包括一个精明强干的指挥官，还包括一种提倡寻找战役层

面突破口的兵法，这种兵法对“普通的胜利”不屑一顾，而是追求实现歼灭性的胜利。隆美尔解决贾扎拉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趁夜深人静之时出动他的全部机械化部队，穿越一片地形单调的沙漠，绕过敌人的侧翼。当英军一早醒来喝上午茶时，才发现整整一支坦克大军出现在了他们精心构筑的防线后方。结果自然是英国第8集团军被击溃，隆美尔占领了在上一年令他饮恨的托布鲁克要塞，而非洲装甲集团军则进入埃及境内，气势汹汹地杀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尼罗河（Nile River）和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5月，但是国防军决策圈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重头戏还在后面。蓝色行动以大胜开局，以惨败收场，可以说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作战全程的一个缩影。行动计划非常复杂，最初的进攻至少有五个德国集团军，以及来自卫星国的三个集团军（后来增加到四个）参加，而希特勒和哈尔德等人下定决心要自始至终牢牢把控行动进程。他们最希望避免的是上一年秋天向莫斯科进军过程中发生的行动混乱，这一因素对德军的失败起了不小的作用。

最初的进攻大获成功，似乎足以证明他们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参加蓝色行动的部队在短短几天内就撕开苏军防线，向着沃罗涅日（Voronezh）一路东进，然后又挥师南下，并以左翼突破了顿河（Don River）。苏联红军似乎被打得不知所措，他们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根本不在这一地段，而是在莫斯科西南布防，准备应对从未发生的攻击。德军兵锋所指之处，一支又一支苏军部队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些人认为苏军采用了一种灵活的新式战法，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望风而逃，而真相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上级指挥机关的撤退命令传达到前线的普通士兵时已经失去了本意。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从德军的角度来看，苏军的逃跑无论是计划的还是自发的，都会威胁到蓝色行动的整个作战进程。在米列罗沃（Millerovo）和罗斯托夫（Rostov），德军的装甲铁钳先后两次在总司令部认为有大量苏军集结的地方合拢——结果却扑了个空。正如众所周知的“林中树倒无人闻”，国防军也打了一场没有敌人存在的包围战（Kesselschlacht）。¹⁹ 本书将用大量篇幅分析德军在这一机动计划失败后的反应。读者将可想象一幅反映德方苦恼心情的画面：一排被撤职的将军，一个咆哮的元首，一堆被临时修改的作战计划，而在背景中是匆忙推进、离自己的给养和弹药基地越来越远的百万大军。到了9月，德军已经陷入困境，两支强大的攻击箭头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被死死拖住，既无力到达其攻击目标，也无法或

不愿后退。运动战（Bewegungskrieg）在俄罗斯南部陷于停顿，取而代之的正是德国军队有史以来一直想要避免的战争形式：静态的阵地战（Stellungskrieg）。几乎与此同时，隆美尔的“进攻战车”也同样掉了链子，他发现自己也被优势的敌军捆住了手脚。结果在两个战场都将发生决定性和灾难性的失败。在充满希望的开局阶段结束之后，德军的1942年攻势将会产生一对难兄难弟：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

在这一调查过程中，我们将尝试回答一些关于国防军的基本问题。一支为了攻势运动战和速胜战而配置、武装和训练的军队是如何应对急转直下的军事局面的？希特勒对这场灾难要承担多大责任？德国总参谋部和前线指挥官又该分担多少责任？有多少是由个人决策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客观的系统性因素，也就是德式兵法所蕴含的军事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复杂组合造成的？纯粹的运气因素究竟占多大比例？

我在写作本书时尽量避免企图说明“德国军队究竟怎样才能斯大林格勒取胜”或“国防军为了赢得战争该做什么”的论证。这是一本历史书。它不会针对1942年的战局提出一系列完美计划——仿佛这些计划现在还能改变历史；也不打算成为一本总结经验教训的手册。那种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分析圣经语句时的自信对各种决策评头论足的做法²⁰在本质上是与历史学无关的（尽管这对士兵和军官的训练或许很有意义）。这种做法就好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书把所有篇幅都用来讨论路易十六可以如何避免革命。一部作战行动史（也就是说明在战役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件和原因的史书）即使不费任何笔墨来推演历史人物应该如何操作，也已经足够复杂了。²¹

我必须承认，有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希特勒在1942年7月下旬分兵两路同时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决定（第45号指令）就是个经典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各级权力机关共同做出的决定：派隆美尔进攻埃及，却没有征服依然卡在他的后勤补给线上的马耳他。但无论如何，在这两个战例中，德军都是功败垂成。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高加索和北非都曾非常接近其战略目标，某些情况下只有区区数百码的距离，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将1942年的历史单纯地视作过眼烟云。

注释

1. 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研究中，最常见的字眼莫过于“转折点”。明确将它与1942年联系一起的作品包括杰弗里·朱克斯（Geoffrey Jukes）所著的《斯大林格勒：转折点》（Stalingrad: The Turning Point, 纽约：Ballantine, 1968年），艾伦·威克斯（Alan Wykes）所著的《1942——转折点》（1942—The Turning Point, 伦敦：Macdonald, 1972年）和唐纳德·格林伍德（Donald J. Greenwood）设计的商业化兵棋游戏（对这类游戏的老玩家来说是“冲突模拟”）《转折点——斯大林格勒》（Turning Point—Stalingrad, 巴尔的摩：Avalon Hill Game Company, 1989年）等。另一些著作中也暗示了这个概念，例如“美国陆军历史丛书”中关于苏德战争的两卷丛书：厄尔·齐姆克（Earl F. Ziemke）和马格纳·鲍尔（Magna E. Bauer）所著的《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决战东线》（Moscow to Stalingrad: Decision in the East,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87年），厄尔·齐姆克所著《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军在东线的失败》（Stalingrad to Berlin: 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68年），以及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关于东线的两卷史书《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The Road to Stalingrad, 纽约：Harper & Row, 1975年）和《通往柏林之路：斯大林对德战争史续编》（The Road to Berlin: Continuing the History of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Westview Press, 1983年）。要想了解治学严谨、细致入微的德方观点，请参见安德烈亚斯·孔茨（Andreas Kunz）的《六十年前：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毁灭》（Vor sechzig Jahren: Der Untergang der 6. Armee in Stalingrad），《军事历史》（Militärgeschichte）2002年第4期：第8—17页，特别是第13页的边栏小文《斯大林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Stalingrad—Wendepunkt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2. 见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之枢机》（一译《命运的关键》）（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The Hinge of Fate, 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1950年）。如果想看对丘吉尔这六卷巨著的源起、构成和历史背景的精妙分析，请参见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所著《掌控历史：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和写作》（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纽约：Random House, 2005年）。

3. 温斯顿·丘吉尔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伟大的同盟》（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1951年）。想了解丘吉尔对其先祖伟绩的考证，另请参见《马尔伯勒：生平与时代》（Marlborough: His Life and Times, 芝加哥：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年），该书将1933年到1938年发行的原四卷本著作合并成了两卷。译注：大同盟原指17世纪末18世纪初奥地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为反对路易十四的法国而建立的同盟。马尔伯勒公爵作为反法联军的著名统帅，为大同盟最终击败法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4. 有关这一观点的讨论，见罗伯特·奇蒂诺（Robert M. Citino）所著的《德式兵法：从三十年战争到第三帝国》（The German Way of War: From the Thirty Years' War to the Third Reich, 劳伦斯：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年），特别是第4—5页。

5. 例如，可参见比格少校（Major Bigge）的《论下级指挥官在战争中的自主行动》（Über Selbstthätigkeit der Unterführer im Kriege），载于《军事周刊副刊》（Beihefte zum Militär-Wochenblatt, 柏林：E. S. Mittler, 1894年），第17—55页，以及冯·布卢默将军（General von Blume）的《指挥官在战争中的自主行动》（Selbstthätigkeit der Führer im Kriege），载于《军事周刊副刊》（柏林：E. S. Mittler, 1896年），第479—534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请参见奇蒂诺所著的《德式兵法》，第308页。

6. 要了解几乎已被遗忘的根根萨尔察之战，见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所著的《普奥战争：1866年奥地利与普鲁士和意大利的战争》（The Austro-Prussian War: Austria's War

With Prussia and Italy in 1866, 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 第75—81页。瓦夫罗治学严谨、文笔优美, 他的这本书是当今最好的著作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先前关于1866年战争的权威著作: 戈登·克雷格(Gordon A. Craig)所著的《柯尼希格雷茨之战: 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胜利》(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 Prussia's Victory over Austria, 1866, 费城: Lippincott, 1964年)。另外还可以参见至今仍有帮助的旧文献, 例如奥斯卡·冯·莱托-福贝克(Oscar von Lettow-Vorbeck)所著的《1866年德意志战争史》第1卷《加施泰因—朗根萨尔察》(Geschichte des Krieges von 1866 in Deutschland, vol. 1, Gastein-Langensalza, 柏林: E. S. Mittler, 1896年), 这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所做的分析, 而且附有精美的地图。此外, 还有特奥多尔·冯塔内(Theodor Fontane)所著的《1866年德意志战争》第2卷《德国中西部的战役》(Der deutsche Krieg von, 1866, vol. 2, Der Feldzug in West- und Mitteldeutschland, 柏林: R. v. Decker, 1871年), 这是普鲁士最著名的作家和小说家之一的通俗记述。如果只了解大概, 请参见奇蒂诺著, 《德式兵法》, 第153—160页。

7. 当今历史学家关于普法战争的最佳记述也是出自杰弗里·瓦夫罗之手。请参见《普法战争: 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征服》(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Conquest of France in 1870 - 1871, 剑桥: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年), 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取代先前关于这场战争的权威著作: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著的《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 纽约: Macmillan, 1962年)。有关普军高层对施泰因梅茨几乎造成的灾难的应对, 见瓦夫罗著的《普法战争》第110页。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的《德国统一战争》(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 伦敦: Arnold, 2004年)以经常出人意料的想法将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三场战争与其历史背景紧密结合, 延续了他在《腓特烈大帝的战争》(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伦敦: Longman, 1996年)中开创的传统, 对军人的动机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阿登·布霍尔茨(Arden Bucholz)的《毛奇与德国的战争, 1864—1871》(Moltke and the German Wars, 1864 - 1871, 纽约: Palgrave, 2001年)也不可 unread, 它是一本立足于组织和管理理论问题的作战史。主要的史料则是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所著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The Franco-German War of 1870 - 71, 纽约: Howard Fertig, 1988年)。另见丹尼尔·休斯(Daniel J. Hughes)所编的《毛奇军事文选》(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 Presidio, 1993年), 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毛奇著作选集, 翻译流畅且注释精准。

8. 应该有人为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写一本英文的军人传记。目前只有兰迪·塔尔博特(Randy R. Talbot)所著的《赫尔曼·冯·弗朗索瓦将军与1914年8月坦嫩贝格战役中的军级作战》(General Hermann von François and Corps-Level Operations during the Tannenberg Campaign, August 1914, 硕士论文, 东密歇根大学, 1999年)提供了严密的战役层面分析。关于坦嫩贝格战役的总体情况, 公认的杰作是丹尼斯·肖沃尔特所著的《坦嫩贝格: 两个帝国的较量》(Tannenberg: Clash of Empires,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Brassey's, 2004年), 该书考据详尽, 读起来令人不忍释卷, 而且其深刻见解(肖沃尔特的所有战史著作的真正价值)中敏锐地把握了推动军官和士兵在巨大压力下行动的因素。诺曼·斯通(Norman Stone)所著的《东线1914—1917》(The Eastern Front, 1914 - 1917, 伦敦: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5年)也是任何想了解中欧强国与沙俄之间战争的读者不可不读的佳作, 还有霍尔格·赫维希(Holger H. Herwig)所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与奥匈, 1914—1918》(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 - 1918, 伦敦: Arnold, 1997年)也是如此。在波纳特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Ponath)的作品《战史、战术和教学评价中的1914年坦嫩贝格战役》(Die Schlacht bei Tannenberg 1914 in kriegsgeschichtlicher, taktischer, und erzieherischer Auswertung), 《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第124辑, 第8期(1939年8月18日): 第476—482页中可以找到德国一方的详细作战记录, 并附有重要地图。

9. 关于科林之战, 见奇蒂诺所著的《德式兵法》, 第69—71页。